

胡小林 袁伯诚 主编



中国 学习 思想 通史

【上册】

人民出版社



胡小林 袁伯诚 主编

中国学习思想通史

【上册】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尤开元
装帧设计:罗 洪
版式设计:东昌文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学习思想通史/胡小林 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5
ISBN 978-7-01-005754-5

I. 中… II. 胡… III. 学习方法—研究 IV. G7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2668 号

中国学习思想通史

ZHONGGUO XUEXI SIXIANG TONGSHI

胡小林 袁伯诚 主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50

字数:1100 千字

ISBN 978-7-01-005754-5 定价:120.00 元(上下册)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序一

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学习、善于学习的民族,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明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离不开学习,离不开学习思想的升华和发展。正如著名学者杜维明先生所言:“儒家文化传统是一个学习文明。儒家能从曲阜、中原、东亚走向世界是‘学而时习之’的结果。可以说,没有学习,儒家文明就不可能延续。”^①在漫长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我们的先贤留下了大量有关学习的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料,对其及时加以整理、总结和研究,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然而,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以往这一领域的研究一直较为薄弱。

胡小林、袁伯诚教授多年从事中国学习思想史的研究、教学工作,时有卓见宏论发表,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他们撰写的《中国学习思想史》于2004年1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后,更是得到人们的普遍赞誉。现在,由两位教授主编的《中国学习思想通史》又要奉献给广大读者,这的确是嘉惠学林、有益社会的一大盛事。

首先,《中国学习思想通史》给人最为深刻的印象是,它立足于中华民族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治学特色,打破目前的学科、专业壁垒,综合

^① [美]杜维明:《走向普世价值的儒家伦理》,庞朴主编《儒林》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贯通,吸收、融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诸多相关领域的各种知识,对中国学习思想发展的轨迹、特点和规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论述。这一学术上的重大突破,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众所周知,思维方式是一切文化的基础,思维方式的不同,是不同文化体系的根本差异。西方的思维方式是分析的,分析到极其细微的程度,但往往忽略事物的整体联系,而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则是综合的、普遍联系的。天人合一的命题正是这种综合思维方式的最高、最完整的体现。我国传统学术和文化教育,受综合思维方式的影响,带有明显的综合、博通的性质和特点,重视通才、通儒的培养。这些通才、通儒,实际上就是一种综合性、复合型人才,我们很难按现在的观念,将他们算作单纯的什么家、什么家,如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等等。虽然我国传统社会的学术兼通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尊孔读经服务的,但这种通才、通儒的文化知识结构还是有其合理性的,是传统思维方式在教育领域的一种自然体现。

近代意义上的学术分科或者说分科立学、分科治学,是在以分析见长的西方思维方式的影响下产生的,出现于中国则是西学东渐的结果,它是随着西学典籍的翻译和传布而逐渐成熟、日益完备的。西方学术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学人按照西方学术分科的观念和原则,对中国学术和学校教育加以分门别类的处理。这最早发生在清代后期开办的各类新式学堂,主要是西方人创办的教会学校,后来清政府设置的京师同文馆等也贯彻了分科立学的原则。随着这一体制的渐趋完备,至1902年,清政府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定了《钦定学堂章程》,其中的《奏定高等学校章程》规定,大学堂有八科,即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各科之中又分若干门,均由学生专修一门。当然,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分科立学并不排斥对通才的培养。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片面学习苏联的经验,学科分得更细了,以致几乎完全忽略了各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此后人们更注重个案的处理和研究,致力于某一学科的某一分支的建设,专门之学的地位越来越突出、越来越

越显赫,通人之学反而不为时尚所重,甚至遭到非议。“这种情况,既是传统学术走向现代的一个标志,也是固有学术向现代转变付出的代价。……学科之不立,品目之不分,固是学术不发达的表现;但学科之间互为畛域,不能打通,也足以滞碍学术的发展。因此之故,中国现代学者中的一些最出色的人物,往往在致力于某一学科领域的专精研究的同时,又自觉不自觉地在打开学科间的限制。”^①

分科立学、分科治学走向极端,使人们对所研究的问题很难有一种整体的、普遍联系的认识和把握,有些学科分得过细,以至于相互之间的联系完全被割断,老死不相往来。有的专业则重复设置,浪费了大量教育资源,导致了学科建设上的混乱局面,而且尤其有碍于对中国古代文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因为主要以古代文献为载体的中国传统学术和文化教育是在综合的、普遍联系的思维方式下产生并发展的,采用在西方分析的思维方式下出现的分科立学、分科治学的方法,是很难对它有一个全面、透彻的认识的,得出的结论也往往是片面的、有问题的。东西方文化的未来,是借助东方的整体着眼、普遍联系的综合思维方式,以中国文化或者说东方文化为主导,同时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把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我国高校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也应更好地合于中国传统的综合的思维方式,自觉地超越现在通行的学科界限,对各种知识加以综合融会,培养更多的古人所说的通儒、通人。当然,我们所说的学科改造、学科整合,也不是排斥在西学基础上形成的分科立学、分科治学,不是简单照搬中国古人的教育模式和方法,而是要在不断完善现有学科体系的基础上,使各学科之间保持高度开放、相互融通的姿态和趋势,发挥好、运用好中国传统文化讲综合、讲整体概念和普遍联系的优势,加快我国高校的学科建设和发展。

① 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总序》,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各卷卷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中国学习思想的研究一直为人们所忽视,其中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下,按照我们目前的学科框架和专业分类,这种研究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根据《中国学习思想通史》的研究和表述,中国学习思想史几乎就是一部天人整体之学,中华民族传统的学习模式几乎就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模式,而该书作者也正是按照这一模式来理解和把握中国学习思想史的。所以,阅读该书,不仅有助于我们真正了解中国学习思想的发展历程,而且也会使我们再次感受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教育模式的无穷魅力,从而增强在新形势下进行教育改革、学术创新的信心和能力。

其次,《中国学习思想通史》的特别突出之处,还在于它对二重证据法真义的准确把握和成功实践。20世纪初叶,王国维先生总结自己的治学经验,概括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即“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将研究视野扩大到地下出土的新材料,深刻影响了中国学术发展的走向。后来陈寅恪先生在为陈垣先生的《敦煌劫余录》作序时也谈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①这是对二重证据法的进一步发挥、发展。其中“新材料”不应专指出土的各种地下实物材料,还应包括往往不被珍视的传世文献中的某些材料。就陈寅恪先生而言,其主要成就还是用新眼光来看旧史籍,从常见书中读出别人看不出甚至视而不见的重要材料。陈先生不因少用或不用出土材料而多读常见书,就“未入流”了。所以说,从常见书中发掘出新材料,同样也是二重证据法的一个应有之义。二重证据法不应变成那些出土文献研究者的专利,更不应变成这些人炫耀学术“预流”而歧视常见书研读

^①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66页。

的工具。实际上,即使是就王国维先生来说,除了甲骨文、金文等材料,不属于地下出土材料的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及其重要价值,也是他推出二重证据法的文献依据和学术动因之一。

以此来看,《中国学习思想通史》就是一部地道的“预流”之作了。书中有不少地方涉及新的出土材料,或用以补益传世文献之不足,或用以论证历史上的重大问题。比如,借助马王堆汉墓帛书和郭店楚简等材料及其相关研究成果,该书基本理清了老子其人其书的问题。而与此同时,由于是从学习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问题,许多传世文献中的常见人物、习见材料也得到新的认识和处理,一些对人们来说并不陌生甚至耳熟能详的东西,也就不断从作者笔下涌出新证新义来了。可见,作者已经把握住了二重证据法的真正要义和思想精髓。

如果说对二重证据法真义的把握和实践还仅仅限于文献考证的范围,那么除此之外,该书在理论抽绎和阐发方面也同样是新见迭出,颇具开拓性、原创性。“由汉氏以来,学者以其所得,托之撰述以自表见者,盖不少矣。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①这是清代章学诚就衡量学术著作高下谈论的一段话。在章氏看来,“独断之学”和“考索之功”,也就是独到的理论见解和扎实的考证功夫,二者之中只要能居其一,即不失有可取之处,而若要达到更高的学术境界,则必须二者兼备,缺一不可。《中国学习思想通史》通过对中国学习思想史的考察、研究,实现了文献考证与理论阐释、“考索之功”与“独断之学”的完美结合。

再次,《中国学习思想通史》始终注意将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进行双向考察和互动分析,对于中国学习思想史,既注意其内在理路,努力探索学习思想本身的机制、规律和特点,又注意其外缘变迁,全面考察外部环境对学习思想发展的种种濡染和影响。该书在论述中国历

^① 章学诚:《文史通义·答客问中》,中华书局1985年叶瑛《文史通义校注》本。

史上某一阶段、某一人物或著作的学习思想时,总是要交代当时的各种社会背景,认真分析社会生活在学习思想演变、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这样就很好地说明了中国学习思想从何而来,又因何而变。

应该说,此举也是对以往中国思想史研究名家、名著之成功经验的继承、发挥和发展,体现了学术研究之盛德大业的后先相继、薪火相传。例如,关于侯外庐等先生所著《中国思想通史》,侯老自己曾总结道:“运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社会史以至思想史,说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我们这部通史紧紧掌握的原则。把思想家及其思想看成生根于社会土壤之中的有血有肉的东西,人是社会的人,思想是社会的思想,而不作孤立的抽象的考察。对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明末清前期启蒙思想,无不如是。”^①再如,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社会和古代思想研究的杨向奎先生也曾指出:“我自走上学术研究之路,就把重点放在了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经学上。但我深知,要研究好古代思想史和经学,就必须重视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研究。因为有着怎样的社会经济就会有怎样的思想意识,而古代思想和经学正是古代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所以,我的研究就是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开始的。”^②看来,力求使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相呼应,是各种优秀的思想史论著的一个共同特点,也是它们能够藏之名山、留誉后世的不二法门。

最后,《中国学习思想通史》一书所展现的治学风格也特别值得称道。该书作者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气势,超越门派观念,摆脱师法、家法的局限,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志在追求历史真实和学术真理。在论述中国学习思想的发展进程时,无论是儒家、道家,无论是古文家、今文

① 侯外庐:《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327页。

② 杨向奎述,李尚英整理:《杨向奎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3页。

家,无论是汉学家、宋学家等等,只要他们对学习思想的发展作出过自己的贡献,书中都要为其树碑立传,并加以认真总结和客观评价。我们知道,在人类文明史上,任何思想学说,如果没有吸纳、融摄其他学说的态度和能力,就不能长期生存并发展壮大。那些真正有生命力的思想学说,都是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政治需要,在保持自我、自信的基础上,对其他学说采取宽容和开放的态度,从中汲取各种养料,以丰富和发展自己。在这一方面,该书做得也相当成功,而且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书中不仅认同前人关于孔老相会记载的历史真实性,而且特别肯定和讴歌了孔子、老子这两位文化巨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认为这具有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开启了此后中国儒道互补的思想文化进程。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相一致,中国思想最古老的源头是一种天人整体之学,它一方面援引天道来论证人道,另一方面又按照人道来塑造天道,实际上也就是天人合一。这种天人合一的思路是由西周天命神学首先确定下来的,后来为儒、道等各家所普遍继承和传扬。不过,各家在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时,又都有所偏重。大体说来,道家的思想偏重于“以人合天”,重点是研究天道,极力使关于人道的 subjective 理想符合天道自然无为的客观规律。儒家的思想偏重于“以天合人”,其重点是研究社会政治伦理问题,往往是根据关于人道的 subjective 理想去塑造天道。所以,这两家的思想各有所蔽,都很难算是完整的天人之学。就总的发展趋势来说,儒家往往要从道家那里汲取自然主义的养分来补充自己,道家也往往要从儒家那里汲取人文主义的养分来充实自己,从而在中国传统思想领域形成了一种儒道互补、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有机结合的基本格局。实际上,当时的思想互补、学术融合已经不限于儒道两家之间。陆续成于战国中后期易学家之手的《易传》以百虑一致、殊途同归为宗旨,本着天人合一的思想理路,怀着强烈的超越意识和包容精神,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试图把儒、道、墨、名、法、阴阳诸家思想的合理内核和有益成分统统吸收过来,然后再进行加工、整合、消化,建构

起自己的思想体系,这样就使它高于百家、超越百家,从而形成了一个承上启下,与九流十家比肩而立甚至超越其上的具有独特风格的思想流派。可以讲,《易传》作为一种内在灵魂和重要源头,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体现了中国思想的共同特征,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学习思想在内。而《中国学习思想通史》的编撰,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对《易传》之文化精神、学术风格的承接、张扬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启发意义。

总之,《中国学习思想通史》是一部以学习思想为线索的全新的中国思想通史,本人乐意将该书郑重地推荐给诸位同道。

张 涛

2005年12月于北京

序二

—

1972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提出一份题为《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的报告,提出“迈向学习化社会”的目标。30年后的今天,联合国已明确把21世纪定位成人人学习的世纪。在中国,创建学习型社会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生生不息的动力。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宏伟目标,给我们做教育工作的以极大鼓舞和鞭策。强烈的使命感使我们闻鸡起舞,先我着鞭,三五学术知己,晤抱一室,动了写一部《中国学习思想通史》的念头,于是灭此朝食,发凡起例,草拟撰写《提纲》,经过聚议修改,形成正式文字。于是邀集青岛大学及枣庄学院学者十人,分工撰述,自2002年春到2004年5月,寒暑推移,兀兀穷年,夜以继晷,大家在教书、工作之余暇,案前榻旁,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夜语昏灯,心不绝于编纂考辨,可谓劳矣!书稿盈尺,堆积在我桌前,我得以沉浸浓郁,含英咀华,克己独喜得诸贤之学术成果。统稿之后,古圣先贤那种学习精神“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契”,^①万象供四时而无穷。

^① 柳宗元:《钴姆潭西小丘记》,《柳先生集》卷二九,《四部丛刊》本影印元刊本。

始识操觚弄墨之乐,飘然脱去公务繁忙之累而自乐其乐也,是啊!乃今知周公之富贵,有不如夫子之贫贱。^①

二

“学习”一词包含着丰富而深刻思想,西方人曰“理念”,中国传统曰“道”。“学习”之“道”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相连接的历史发展变化、不断更新、生生不已的形态概念,是人类社会由野蛮到文明、由古代到现代、由此民族到彼民族的一个互动性、事例性和持续性的活动。“学习”既是一个与人类、国家、民族、集体的生存发展的命运相关的过程,也是一个与一个人的个体生命过程休戚相关有如衣食不可或缺的过程,引而申之,“学习”也必然是一个不断推动人类社会发进步的过程。

中国人的学习自古至今颇具民族特色,简而言之就是“修己益人”,即不仅要学会对生存的终极关怀,而且也重视对个体的(特别是平常人)的生命意义的深切关怀。前者以汉儒为代表,后者以宋儒为代表。中国的学习思想史几乎都是一部天人整体之学,就是说,学习必须站在天人整体的高度,把个体生命的意义纳入人类整个命运之中,因而特别强调“修己”、“内圣”,从孔子就讲“反求诸己”。追究个体生命的意义,必然走向主体意识的自觉和精神境界的提升,进而“益人”,即“外王”,“修齐治平”,树立起对现实社会的担当意识。而“修己”必须转化成外在的现实行动,在社会实践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体现人生意义。“修己”——“益人”是不断循环的学习过程,或者说是知与行不

^① 苏轼:《上海直讲书》,《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四十一,《四部丛刊》本,转印上海涵芬楼借吴兴张氏南海潘氏藏宋刊本(影印)。

断循环的过程,随着这种学习循环(“学而时习之”)过程从幼到老,日日月月年年深化,人的知识、技能、思想、境界也在不停地进步、提升、日新月异,由“而立”—“不惑”—“知天命”—“耳顺”—“从心所欲”—无限,就能体验到“浑然与物同体”的天人合一境界。宋代儒家宣传学习可以使“人人都成为圣人”,就是要全社会的“人人学习”,宋代儒家讲“三日不读书,如坐枯井”,说的就是学习是终身的,学习对于人生命的重要和是对生命的一种渴求。

当然,现代社会的学习与传统社会的学习已有很大不同,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学习的规律也在变革,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不仅打破了学习思想中把学习仅看做个体性活动的藩篱,而且已经冲破传统社会区域、民族、国家的界限。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要求营造一个全球性的学习目标、景观、氛围,形成一个人人都是学习者的意识,学习的重心由社会科学转移到科学技术,并把二者结合起来;学习必须凭借一定机构和体制(学校、科研所、实验室、仪器设备等)才能产生自觉学习的群体效应,充分调动全社会学习的自觉性和主观才智,个体学习与群体学习互动互补,个体借助群体智慧发明创新,才能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才能探月球,访火星。因此,现代学习仅有书本、图书馆不成,还必须有电脑、实验室、实验场地,才能跟上现代科学技术与知识经济时代发展的节拍。当今的所谓“文盲”不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不懂科学的人,跟不上学习型社会飞速发展的人。因此,现代化要求学习从个人行为转变为“全民学习,终身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求人们从传统的书本学习中解脱出来,从背诵、吟咏、作诗著文的模仿性方式转变为培养创造性思维的方式,由德性修养学习转向智型学习,把“为学”与“为技”结合起来,由重直觉体悟内省的思维方式转变为实证、检验、外向的思维方法。“世界性的相互依存的增长”都要求突破传统学习方法与理论,世界上每天都在出现许多问题,在规模上具有全球性,在性质上涉及全人类利益,在解决时要求全世界范围内协调一致。因此,21

世纪学习的着眼点是全球化。学习在真正意义上联成一个世界性的不可分割的发展的整体学说,现代化工业生产和生活方式因强力向外扩展而普遍化,把世界上最边远孤立的民族都“卷入了发展的旋涡”。在这种时代,再清谈“古文”与“今文”,“南学”与“北学”,齐鲁之学与吴楚之学,将是河伯见笑于北海若。

这样说,传统的学习思想都要抛弃、对我们现代人的学习一点用处没有了?非也,真是那样,我们写的《中国学习思想通史》岂不成惠施园子里的“大瓠”(《庄子·逍遥游》)了吗?现代化、科学技术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又成为人类异化的客观力量,已经使西方的大批思想家深切地感受到现代人在物质享乐的诱惑下,精神价值和生存意义的追问被搁置起来,形成了科技发展与精神沦丧的二律背反,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福祉,同时也使人类“沉于物,溺于德”。求疗现代人的心灵沉疴,西方人提出不少方案,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人对现代工业文明下人类已丧失的对人之崇高神性和皈依也有警觉与批判,中西思想家都试图在日益荒漠的人类的心里重建精神家园,虔诚呼唤“诗意地栖息”,便共同把探索的目光投向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学习思想,从中国的儒、释、道的文化智慧与学习思想中寻求“天人合一”的学习模式,吸收其人文主义精神,来创建学习型社会。我们就是在这种时代的文化、学习的大背景下来撰写《中国学习思想通史》的。此书作为“五石之瓠,何不虑以大樽而浮乎江湖”(《庄子·逍遥游》)?让学者们摆脱“物欲之累”,“将磅礴万物以为一,世薪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庄子·逍遥游》)

三

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学习思想是“天人合一”的模式,分而言之,

它有几个显著的特点。

(一)人通过学习,达到对天道的认识和人的存在合而为一,就是智慧之境。智慧之境作为人的存在的一种理想形式与现实人生的关系密不可分。中国学习思想不仅可以从天道观、方法论、语言哲学的角度来探讨,还牵涉到人生论和境界说的问题。学习所要达到的智慧之境,本质上是自由之境。人的学习过程也就是人在化自在之物为自为之物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精神由自在而自为、由人性发展为自由的德性,人的主观世界的改造即是通向自由意识的精神历程,这是中国学习思想史不同于西方之处。西方学习思想中对科学知识、知识经验的理解,是实证主义的,西方人不把学习思想看成是一种生命学问,强调其科学、客观、超然(detachment)的品格。中国学习思想中不仅有得和达的问题,更和个体的存在状况密切相关,研究学习思想史中的个人才智、品性、求知的热情、判断力、信息以及其所置身其中的文化传统,都极为重要,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给那些对中国学习思想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单独立传的原因。

(二)知行观是中国学习思想中极为重要的问题。中国学习思想的原创者孔子开宗明义地说:“学而时习之”。提出了学习中的知行观命题,学(知)与习(行)相结合而重心在“习”(行)字上。而“习与性成,方是乾乾不息”(《颜习斋言行录》、《为须》三)。“习”是学习者躬身践行的一种精神,不仅仅是学知识过程中“复习”、“温习”、“练习”等巩固已得知识的方法和步骤。用《易·乾·象》上的话来说“习”的精神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也。这样,习(行)必须以性与天道为主导,是一种知命的功夫。秦汉时期,在知行观上能近于孔儒者要算是王充。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儒学玄学化,玄学家兼融道儒,崇尚清谈,加之佛玄合流,受佛学般若空宗之影响,在知行观上知与行离,或重知轻行(“习”)。到宋代,偏离孔子知行观更远了。朱熹的“致知力行”说是从伊川学说中发展而来的。他作为宋代理学家中集大成的学

者,不但继承了伊川学说的传统,并且吸收了当时各家学说,加上他自己的创造而成为一个体系,因此,很有代表性。陆、王心学知行观最大的代表人物是王阳明。他是承袭宋儒陆九渊(象山)的学说而加以发展的。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的要点是说读书不是学问,它在学习过程中占很小的地位,学习为了做人,做人就要躬行实践。他认为知与“行”是一个过程中互相依存的两个方面,他的所谓“知”,绝非反映客观存在事物的认识;他的所谓“行”,决非变革社会现实的社会实践,他“知行合一”说的实质与我们说的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认识与实践的统一,是大不一样的。中国古代知行观中正确的代表人物是颜习斋和王夫之。颜习斋从对王学末流空疏学风的沉痛反思中,深感“思不如学,学必以习”。王夫之的知行观,前后有变化。他早年主张知行并重,后来又特别重视实践,认为实践有决定性的作用。他竭力反对宋、明以来儒者对知行纷争于“知先行后”、“知不先行不后”以及“知行合一”诸说。中国传统的学习思想中的知行观,从孔子到王夫之,再到毛泽东,有许多精华,不仅对当代有意义有价值,而且应当成为永恒性的、属于未来也用得着的智慧。

(三)中国学习思想中贯穿着一条王官之学与民间之学互动、感应、消长的规律。夏商礼乐之学至西周大盛,传至东周而衰。礼崩乐坏,王官之学瓦解,学术下移,由“学在官府”,走向四夷,民间私学兴起。自春秋战国开始就出现王官之学与民间之学互动移位的现象。王家之学起始之初,就缺乏昌明兴盛的气象。中国的文化往往是在王家与民间循环,王家气衰,民间则丰,下者久蓄而盈,必返回升华于上。先秦元典中的《诗经》就是由民间之学走进庙堂的,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并非是天堑悬隔,它们之间有一条文化“通途”,《老子》曰:“道者反之动。”这上下循环的轨迹在于社会的变革所提供的条件的成熟与否。中国历史上历次文化转型多是由于民间学术力量的推动,这是不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国传统学习思想自汉以后虽然以儒学为主